

联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37/704

S/15512

8 Decem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七年

1982年12月7日约旦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加拿大的克里斯·贾诺医生在国际调查以色列侵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罪行委员会1982年8月15日和16日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证词。

贾诺医生的证词是目击者关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平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经过的说明。

以色列居然能够对无辜平民和民间目标，包括医院、学校和其他设施犯下这种暴行，的确难以置信。

我要强调，贾诺医生的证词叙述的是在他履行人道主义任务的一家西顿医院周遭的小地区内发生的事，这只是由于贾诺医生是上述笔墨难以形容的罪行的目击者，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

在纯粹人道主义领域工作的中立国际观察员的证词中也提供了其他令人发指的情况，在适当时机我将把这些证词转达给你。

A/37/704
S/15512
Chinese
Page 2

请将所附贾诺医生的证词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1）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 (签名)

附件

国际调查以色列侵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
民罪行委员会（1982年8月15日和
16日，尼科西亚）

克里斯·贾诺医生（加拿大）的证词

我的名字是贾诺医生。过去两年，我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一名外科医生。我是纳巴蒂那医院的医疗主任，最近在敌对冲突期间我在黎巴嫩的西顿工作。我既不是黎巴嫩政府的发言人或代表，也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人或代表。

6月13日至6月15日，我在黎巴嫩的西顿被以色列当局拘禁，直到6月20日为止我被囚于以色列北部的麦吉多（阿尔马吉顿）监狱。尽管加拿大和挪威外交部都已出面，以色列当局一直到6月18日还拒绝承认拘捕了我和我的两位挪威同事* 6月20日我被“无条件”释放，离开以色列监狱。我既非获释而由加拿大大使馆监管，也不是被驱逐出境，我未曾受到任何控告。我们获释并且今天自由地前来出席这个委员会，完全因为我们是加拿大和挪威护照的持有人。我的许多不同国籍的同事仍在监禁之中。外科医生、全科医生、男护士、护理技术员和救护车驾驶员，他们同我们一样清白无辜，但因为他们未持有我们这样的护照，所以现在仍受拘禁。

* 斯坦纳·伯奇医生

奥伊文·莫勒先生，儿童心理学家

我觉得有点象但丁著作里的一个人物。找到了地狱而又回来。许多其他的人却没有这样幸运。

我亲眼见到了无数人惨受痛苦和死亡的煎熬，现在从这个宁静的环境回过头去看，我的记忆似乎有点超现实。

我亲眼见到住宅区全部被彻底摧毁，也亲眼见到难民营被飞机、炮舰、坦克和大炮同时轰击和地毯式轰炸，受到盲目、野蛮和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在占地几平方公里的艾恩希勒维难民营，发生战斗之前的人口有 60,000 到 80,000 人，如今的情景犹如世界末日。现在没有一栋房屋是幸免的。有些地区，人们再也不能辨认从前的道路和建筑物究竟在那里。剩下来的是大而发黑的弹坑，里面堆着断瓦残垣，破裂的水泥板和弯曲的铁条以及尸首。有些地区已经改变了面貌。大自然似乎已受了损伤。如果一个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 15,000 至 20,000 人的地区已被夷为平地，而说该地区的平民幸免于难，这在措词上是互相矛盾的。

我曾经亲眼看见医院被炸，就在我工作的主要难民营对街的艾恩希勒维政府医院，从 6 月 7 日至 10 日被攻击五次或六次。第一枚炮弹击中一楼的水管，以后几天，我们不得不喝静脉注射溶液，6 月 9 日，一枚炮弹击中急诊室，炸死了躲在那里的四十到五十个人。

6 月 11 日，我曾目击妇女和儿童获准通过以色列封锁线回到难民营，但两个钟头之后就恢复了对难民营的炮轰。我曾目击难民营内及其周围的平民处于混乱状态。以色列飞机撒下传单，告诉人们跨越以色列封锁线离开敌对冲突区。但落在难民营内的传单非常少。以色列当局后来表示他们并已使用扬声器，但我们在医院里从来没有听到他们的喊话。我们一直不清楚人们确实应该往哪儿跑；跑上一脉或另一脉山丘，跑到海边去，或者甚至在政府医院里重新组合。有一次，在 6 月 9 日，有 3,000 到 4,000 个平民躲在医院里避难；有全家大小，老年人和那些同家庭失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医院里，但医院却继续受到轰炸。

我曾见到他们使用集束炸弹，早在6月5日就在纳巴蒂耶城见到，后来又在艾恩希勒维难民营见到。我曾见到锥形的钢筒残骸，每个角上有弹簧附着的铝架，还有钢筒内放置炸药的凹槽。我听到这些炸弹在难民营中间爆炸的声音，这是绝不会听错的；在10秒到12秒之内有数百响的小爆炸声，就象是以小武器激战一样。我曾见到燃烧弹受害者烧得焦黑的尸体，仍然保持死亡那一刻的姿势。我治疗了一些被震荡炸弹炸伤的人，皮肉只受轻伤，骨骼和肌肉却被弹片击碎。

我在疏散政府医院时，在艾因希勒维营地周围地区目睹了300具尸体；在政府医院的急诊室目睹了40至50具尸体，在医院内目睹了20具，都是我的病人，其中有一名妇女被一枚落在医院花园中的炸弹弹片飞进窗户打死，留下了一个出生仅五个小时的孤儿；我在政府医院疏散后回到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医院，在那里目睹了两具尸体。此后，我在西顿私立大医院之一（加山·哈穆德医院）又看到了25具尸体。上述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传说城内比比皆是的其他受害者。所以，我仅在艾因希勒维营地和西顿市几个小小的街区就目睹了大约400人被害，而这个数目约占以色列当局承认的整个黎巴嫩南部地区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三。

我目睹了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驻西顿和纳巴蒂耶医疗队全体男工作人员遭到拘留，不能继续履行医疗职责，得到的待遇同普通囚犯一样，人身完全不受尊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曾经是黎巴嫩南部主要的医疗机构之一，拥有3所医院、许多门诊诊所和一个智力落后儿童与职业疗养中心，莫勒先生夫妇就在那里工作。现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这个地区已不复存在。

我目睹人们由于蒙面的通敌者的告发而被逮捕，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告发者、罪名是什么。西顿市所有越过以色列封锁线以脱离敌对行动区的男性居民，都被赶到海滩上，然后被带着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三辆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每一辆吉普车上都坐着一个头戴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人，或者是一个用毯子围裹、遮住面部的人；每一个人身旁都坐着一名以色列士兵。随着人们从东边列队走过，有一些人就被挑出来，退出队伍，在背上写一个大大的“X”字或者是几个希伯来

字，然后就靠墙站着。就这样有 4,000 至 5,000 人被捕，包括我、两位挪威同事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驻西顿的全体男医务工作者。我后来获悉，蒂尔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工作人员也遭到相同命运。

这是最使人感到恐怖的遭遇。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应付战斗。可是，如果站在一个隐藏在假面具之后的人面前，谁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你不能面对面地看见控告者……甚至连想作解释都不可能。你不知道有什么罪名，任凭某种盲目告发的摆布。

被捕者在遭到拘留之后，被带到一个修道院学校的操场上。那里总是有 500 至 600 名囚犯，新的囚犯一批接一批不断地来，另外一些人又被带走。拘禁的境况很差；手绑在一起，人热得喘不过气来，食物和饮水都不够。囚犯被带到用作审讯室的三间教室之一。我本人在那里关了四天，就受了五次审讯。有一次审讯时，我能听见隔壁房间里打人的声音，而且在那名囚犯出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模样。他的脸肿了起来，眼睛乌青，嘴角上淌着血。在操场上能看见那四十个以色列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囚犯。有的囚犯大声要水喝，卫兵说没有水。如果他还要再叫唤，就会挨一顿辱骂，那时就会有一个卫兵挤进人群开始揍他。人身受到的虐待有拳打脚踢，也有用木棍、塑料管抽打，甚至把头上系着螺母螺栓的绳子扎成一捆打人；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九条鞭。一位巴勒斯坦的纳比尔医生有一次被两手绑着吊在树上挨打。一位伊拉克的外科医生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遭到几个卫兵的毒打，然后被扔在骄阳下干晒，脸埋在沙堆里。其他外科医生和医生也挨了打：艾哈迈德·苏布拉医生，黎巴嫩人；萨费丁医生、穆罕默德·伊曼医生和沙菲克·伊斯兰医生，孟加拉国人。两位挪威人和我没有挨打。我本人只挨了一下打。显然是有命令不准骚扰我们。肤色比较深的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印度人）是被打得最厉害的人。

我目睹了四名囚犯被活活打死。一个以色列士兵叫我去检查其中的两具尸体。伯奇先生检查了另外两具，而且还看见五、六具尸体给塞进一辆救护车。我说不上救护车里的那五、六具尸体里面是不是也有我检查过的两具。所以，我不能准

确地说出那四天里被打死的囚犯数目。

我亲眼看到，以色列军官、甚至西顿军事长官阿农·阿莫泽上校对这种拷打视若无睹，放任不管。我还看到，有几个以色列卫兵想制止拷打，打人的卫兵和想制止的卫兵好几次真的吵了起来。

有一次我向审问我的军官要求，如果确实有必要拘留我，那就把我关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医院里，我可以照顾病人。他们没有答应。莫勒太太在拘留后还留在医院里，她说，有一名病人死亡，另外一些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其它医疗。麦吉多监狱里的拘留条件要好得多；有水喝，有食物，手也不再绑起来了。不过，只有极少数囚犯关在这所监狱里；两名挪威人和我，两百来个埃及人，一个以色列军官训练他们高呼“贝京万岁”，还有一个具有黎巴嫩—奥地利双重国籍的人，已经和其他几千名囚犯一起在监狱周围的旷野上度过了好几天了。旷野里的情况同西顿学校操场上差不多；囚犯都被绑着呆在露天，饮水和食物是配给的，拷打连续不断。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两天以后，被戴上手铐、蒙住眼睛带到室外过了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监狱周围院子里的一排小木屋中受到审讯。

最后，6月20日傍晚，我们被带到特拉维夫，释放给外国武官联络处。